

同性恋爱

HOMOSEXUALITY

同性恋是一个社会深层的性苦难和性悲剧。本书囊括了古今中外有关同性恋的科学研究成果,坦诚、认真而又清晰地回答了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

人类的性焦虑和性痛苦大部分来自无知或误解。这本资料翔实的学术著作,可以帮你澄清疑虑,坦然享受健康人生。对扫除性盲,防治性乱,优化性恋将会做出重要贡献

张北川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同性恋(又称同性恋),是人类性心理、性行为中一种重要而常见的特殊现象。本书以现代性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同性恋的起因、预防、处理方法,以及它与各种性偏离、器质性疾病的关系,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做了论述。其中特别是对同性恋与性有关的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分类、诊断与治疗;同性恋与有关的性偏离,同性恋的起因、预防和治理,做了详细地论述,还深入探讨了人类性道德、性法律及对同性恋认识的历史演变及其嬗变。以期改变我国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医学界对这一常见社会现象的知识匮乏、认识肤浅的现状,并帮助广大读者澄清这一现代性误区;帮助异性爱大众科学地认识与对待同性恋者,并帮助同性恋患者增强自我规范的力量。

ISBN 7-5331-1201-6



9 787533 112011 >

ISBN 7-5331-1201-6
Z · 84 定价 25.00 元

同性爱

张北川 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鲁新登字 05 号

同 性 爱

张北川 著

*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玉函路 邮政编码 250002)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 插页 474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31—1201—6

Z·84 定价 25.00 元

性爱在人间（代序）

秦士德

—

同性爱又称同性恋。爱和恋在中文里意义相近，目前多用同性恋一词。但作者为什么选用同性爱而不用同性恋为题呢？据作者谈，恋字太俗，常为君子所不齿，故选用爱字为题，以示对同性爱者的深切同情和人格尊重。由此也可见作者用心之良苦。

想来也是。在繁体汉字中，“恋”字的“心”在下，难免“下流”，“愛”字的“心”居中，可算“中庸”。要写一本符合科学的、不偏不倚的“中性的”著作，用同性爱为题似乎更恰当些。

可叹的是，爱恋从来又都是偏心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例如有人认为同性爱者为丑恶的一类，有人则认为同性爱者并不比异性爱者“下流”，真是见仁见智。那么，真理在哪里呢？真理应当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书作者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洋洋 50 万字的著作，囊括了古今中外有关同性爱的主要事实和科学研究成果，为读者展现了性爱心理的一角。

其实从文义上说来，爱有三个层次。一是抚爱或圣爱，表现为爱祖国，爱人民，尊老爱幼之类的美感；二是友爱或喜爱，

表现为对一般人或物的好感；三是性爱或情爱，表现为对异性或同性情侣之间的性感。抚爱和友爱被公认为是圣洁美好的，这毋庸置疑。而性爱却有善恶荣毁之分，因而导致了无数的性苦难，为社会带来几多血泪和悲哀，这之中也包括同性爱者的呻吟。

要深入了解、正确对待异性爱、同性爱和形形色色的性现象，从历史渊源上追本溯源恐怕不是多余的。

二

性爱与食欲同为身心的基本欲求，“食色性也”。但是，人们为什么在饮食上可以大吃大嚼，而在性爱上却必须谨小慎微呢？性爱为什么常使人们陷于圣洁与下流、美好与卑鄙的两难处境呢？

性爱的沦落是有其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历史根源的。除人而外的一切动物，其性欲和食欲一样，都是自然而然，几乎是百无禁忌的。而人，从穿上裤子的那一天起，就表现出对性的羞耻观念。在中国汉字里，“羞”就是又差又丑的化身；“耻”有耳闻即止，不可窥看的内涵。为什么性的表现是又差又丑、不可窥看的呢？这首先是因为，性羞耻和性禁忌有其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根源。

自从5亿年前动植物有了雌雄之别，就有了性的生理活动。3亿年前动物进化到爬行动物，出现了大脑皮层及其相应的、原始的心理活动，其中有关性的心理活动就是性欲。没有大脑皮层也没有性交接器官的鱼儿，虽有雌雄的追逐，但却把精和卵各自排在水里受精，它们只有生理上的接近欲却没有心理上的接触欲。随着动物大脑皮层的进化，性欲之火越烧越旺，与心

理有关的接触欲、插入欲、性交欲，连同形形色色的性器官蓬勃进化，都表明了动物存在着性张力，而这种张力又总是要释放的。到了人类，性欲已成为“全天候”的。一般的高等动物，只在一天，一个月或一年之中的某个时期有性的欲求，而“万物之灵”的人的性欲，则不分昼夜、日月和季节，只要有条件，随时随地都可以迸发出来。

性欲的要求是每一个人的个人之事，而性欲的满足则通常需要两个人的合作。而双方的性欲并不总是恰到好处、水到渠成的。在原始社会里，当一方欲火中烧而对方无动于衷时，“饥不择食”的一方（往往是具有“进攻工具”——阴茎的男方）就难免要施行强暴。所幸的是，在此种“灾难”发生之前总有一个先兆，那就是阴茎的勃起，它可以使当时尚无性欲的女方事先躲避。而男方为了掩盖这个讨厌的信号，只好采用遮阴物。这个遮阴物就是最原始的“裤子”，或者说是亚当的树叶。当然，裤子并不只对男性有用，女性为了使自己具有性感的外阴少惹麻烦，招引事端，也还是穿上裤子遮盖起来为妙。

在炎热的伊里安岛，没有被现代文化的性羞耻所熏染，那里的拉尼族男女土著都是赤身裸体的。然而，他们的男性成年人都戴着醒目的、自制的阴茎套。他们男女分居，女性万万不可进入男性的茅屋。男性戴阴茎套决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掩盖不识时务的勃起。而不允许女性进入男人们的茅屋，也是为了避免性的挑逗，导致各方的难堪。这种羞耻感和性禁忌的萌芽足以说明，裤子很可能是从原始的阴茎套拓展演变而来的。可见，人类因羞耻感而穿上的裤子，是男女双方在性欲上“供求矛盾”、“男女智斗”、“尔虞我诈”的结果，是“上帝”对人类有了智慧，偷吃禁果的惩罚。于是，宣泄性欲这件大事就从

生理上、心理上的欲求，上升为伦理上的调适，成为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

三

属于低级心理的、直来直去的性欲被裤子一挡，就引发了曲折的、隐密的、更高级的性心理活动，那就是眉来眼去、甜言蜜语的“曲线求爱”过程，也就是历代文人墨客赞不绝口的柔情蜜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价高就高在它是人类一种高尚的思维活动，而不再是一种禽兽式的追求方式；是以情动人，相互尊重，求得融洽，使性的欲望得以完美实现，使双方都能达到心理满足的极致。然而，又是“好事多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又为自己的性爱加上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制约”。也可以说，人类有关性的伦理、道德，是人类为自己的性欲穿上的无形的、高尚的“裤子”。这种“裤子”制约着每一个人的性意识。

人类曾经历了 800 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那时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原始的、质朴的。近 1 万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积累和私人占有，导致了阶级的分化和婚姻、家庭的出现，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逐渐转化。有关性放纵和性禁忌的那些原始的质朴的道德观念，也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发展。以性生活为例，从男女乱交到节日群交，又从血婚、伙婚到偶婚、专婚，从族内群婚到族外杂婚。有关婚姻和家庭的那些无形的和有形的伦理道德，铸成了越来越精致的“樊笼”，在外面的想进去，进去的想出来。少数得其门的人可以“飞进飞出”，而大多数不“安分”的人，则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

与总的物质演化规律一致的是：越是晚近出现的运动形式，如心理模式和伦理道德，其规则和内涵越是脆弱多变，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曾几何时，流行于西方的束腰和流行于东方的缠足，已不再被认为是具有美感和性感的了。在中国，企图流芳千古的贞节牌坊，已一个个被推倒砸烂。终身守寡的人不再为“美”，人工流产的人也不再为“丑”，从一而终的人也不再被人们奉为楷模……

“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制与它同归于尽吗？”恩格斯的这些话乍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都是大实话，是科学的、必然的。传统的、宗教的、封建的卫道士们挥舞着大棒一路杀来，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仍然使人们把自己的性爱隐藏在头脑深处。这不仅使相当多的异性爱者的日子很不好过，更不好过的是那些同性爱者。古希腊或秦汉之际社会上对同性爱的宽松氛围，早已被后世代之以残酷镇压。直到如今人们谈性色变，谈同性爱更是噤若寒蝉，而本书作者竟敢以“同性爱”作书名，编辑和出版社竟敢于把它公诸于世，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声响雷，它那震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想而知的。

四

吃是一个人的事，性是两个人或多个人的事，这就要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要讲究伦理道德。性的伦理道德是否运用恰当，标准有二：一个是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性学观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著作中，充满着精辟的性学见解。诸凡涉及社会科学伦理

道德的研究课题（包括对同性爱的研究），如果没有正确观点的指导，就等于失去了准绳。讲究发展变化、普遍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样是性学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准绳。

与性欲有牵连的三件事是：生育后代、生活乐趣和生产消费，即所谓“三生有性”。与性犯罪有牵连的“四非”原则是：不多生劣生，不伤人身心，不传播疾病，不扰乱社会。在“三生有性”之中，家庭式的生产消费已让位于社会大生产，生育后代的事也被优生优育、计划生育所限制，唯有生活乐趣一项，只要它不违反性犯罪的“四非”原则，是本无需多所指责的，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未来世界“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需干预的私事。”“难道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但是，文化的、宗教的、封建的传统观念，使人们不敢把性和乐联系起来，不管你是异性爱者还是同性爱者，凡提倡“性乐”者一律有“罪”，统统“卑鄙下流”。其中占人口少数的同性爱者的处境更糟。

容不得异类的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白人容不得黑人，大民族容不得小民族，多数派容不得少数派，有权有钱的容不得无权无钱的，强悍的男人容不得柔弱的女人，异性爱者容不得同性爱者……凡此种种，都使人间平添了无数不必要的灾难。自己要活，也应该让别人活，大家才能活得更好。性的问题尤易被某些“道学先生”当作整人的工具，借以表明自己的“纯真”和“正统”，并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爱因斯坦曾指出，人们不仅要容忍个人之间和集体之间的个性差别，而且应当真正欢迎这些差别，这是一切真正宽容的实质。要是没有这种最广

义的宽容，就谈不上真正的道德。

应该承认，现实世界既是统一的，又是五彩缤纷的。就以性爱来说，它既有取得性乐，满足性欲的共同一面，又有态度、恋谱、恋式各不相同的一面。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以态度而言，有人只有一个性伴侣却能欢乐终生，有人虽妻妾成群却仍寻花问柳。以恋谱而言，在异性爱、双性爱和同性爱之间，按金西分类就有七个层次，这之中还不包括易性癖等。以恋式而言，为了满足接触欲和插入欲，人们有无穷的求爱方式和接触方式。在这些接触方式中，不但有抚摩、亲吻和性交，而且有手交、肛交、口交、器交、虐交、兽交、尸交和乱伦等等。生殖器官在泄欲过程中竟有可能触及各种的人或物，以及各个部位的皮肤和粘膜。这一切乍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都是性学深处活生生的现实。对此，本书在同性爱的范围内做了详尽的论述。

五

也许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人们对同性爱的研究比对异性爱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世界对同性爱的研究虽说不上波澜壮阔，也算得上风起云涌。但在国内，本书无疑是一朵报春花。世界著名性学家金西经反复调查，又用 12 种方法比较对照，证明 20 世纪前期在美国，尽管有强大的传统道德和宗教势力反对“性乐”和“乱来”，但 35 岁以下未婚成年男性中，有一半左右的人有过同性性行为。若要镇压或治疗这些“不道德”的同性爱者，至少要隔离 1/3 的男性。因此他认为，“‘同性爱’是人类拥有多种能力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多种能力正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我国，“高尚圣洁”的卫道士们比美国多得多，

加上宁“左”勿“右”，以言代法的种种性政策，同性爱自然也就被藏在衣箱的最底层。性学家的初步调查表明，我国有同性性行为者远不及美国的 1/10。这虽是冰山的一个尖，但也足以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方圣土之下冻结着多少性苦难，谁也说不清。

旁观者清，当事者迷。本书作者张北川医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异性爱者，由异性爱者来写《同性爱》，肯定会写得更客观、更科学。作者参阅了数百部有关性学的中外书籍和大量论文，利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花了两年的时间，夫唱妇随，夫写妇抄，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说明了两人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对性学事业的执著。更想不到的是，本书又是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孔老夫子家乡的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我本无能力为这样的巨著作序，但又深为上述诸勇士的执著精神所感动，于是拉杂写来，实难反映本书的意义。好在读者需要看的是书而不是序。我期望本书能在扫除性盲，防治性乱，优化性恋诸方面多有贡献，为性学事业张目，为世界增添爱心。是为序。

我为什么要写《同性爱》（代前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前年上元，初稿落笔；今岁除夕，四稿杀青。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两度寒暑，日日工作之余，便是阅读、思考与写作。即使是节假日，也未敢偷得一日之闲。个中甘苦，如鱼吞水，冷暖唯有自知。

着意写此书时与写作中，友人数量相问：何以试笔这个题材？本非约稿，更涉“禁区”，出版界能否有人理解你的初衷？这些问题，写作中也曾萦绕在我心头。如今文稿脱手，终于可以静心作答了。作为临床医生的我，写这个似乎无聊多余、不登大雅之堂，甚至可能激惹起某些人“鸣鼓而攻之”的题目，只是有感于时和有感于事。

首先是有感于时。

80年代中期，为配合临床性病学教学，我用业余时间医学院4年级本科生开办性学讲座。授课之余，一些热爱科学、勤于求知的同学询问有关同性爱（即同性恋）的知识。当时我对此仅略知一二，只能勉强搪塞。为使这种憾事不再重现，我有意去阅读有关书籍。读书中发现，早在1920年，潘光旦教授在清华求学、读毕埃利斯（潘译作露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录》后，

即有学子就此向他讨教。

1989年，我赴某省一性病讲习班讲授性学概论，又有学员问及有关知识。这次的提问者是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面对各类性问题的临床医生。自潘先生回答学友询问到80年代末，一个多甲子的岁月悄然飘逝。时代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我国大众对同性爱的认识仍在“零的起点”上踏步。这实在应当说是科学的悲哀。

1990年，国内一以研究性病为重点的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涉及男性同性恋者性心理的论文。由于此类论文国内罕见，而这一主题又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临床价值，期刊特地为该文加了按语。“编者按”指出：“同性恋当然是性变态的一种，直到现在，其原因尚不明了，有关性医学书籍也未很深入探索，还没有满意的疗法，而同性恋行为对传播性病，尤其是艾滋病有重要影响，所以有必要加以研究。”这个按语既有一定指导意义，又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对同性爱的起因和它在人类性心理、性行为学中的意义，现代性学已经做出基本答案。而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重要性现象的见解和有关知识的传播，仍大抵滞留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早期性学水平上。这个巨大的时间差，不能不令人扼腕。

我国同性恋研究的落后局面，在许多专业著作中反映出来。近年在国内学者撰写的多种性学和涉及性学的著作中，论述了同性恋。这些书几乎均为1985年以来出版，著者中很多人是临床医学或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或法学专家。他们介绍同性恋时众说纷纭，或知识陈旧，抱残守缺；或语焉不详、浅尝辄止。偶有见识精到的，却又失之简略。一些国外现代性学著作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则因社会文化背景与我国大相

径庭，又无法直接“拿来”为国人所用。

正是这种现状，使我萌发了写一部《同性爱》的意向。

促使我写此书的另一原因是有感于事。

80年代以来，我在工作中多次接触不同类型的同性爱者。这些求医者形形色色，有的已逾不惑，有的尚未成年；或是因为轻率地参与不负责任的性活动，结果被性传播疾病所纠缠；或是由于舆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陷入难以自拔的心理问题沼泽之中。他们唯恐染上无法医治的性病，担忧婚姻与家庭因此解体，害怕人们的激烈抨击，畏惧法律的无情惩处。他们为可能面临的种种不幸战战兢兢，又无法改变自己的性定向。我还不止一次地遇到同性爱者焦虑的家人，他们为自己亲属是同性爱者忧心忡忡。这些无处寻觅有关知识的人都寄希望于医生，渴望医生能把他们从无尽的精神折磨的苦海中解救出来。还有少数同性爱者在盲目的性能量驱使下触犯了刑律，沉浸在深深的悔恨之中，也把改变自己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

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尽管罕见、但确实存在着的令人十分痛心的现象。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画家、科学家达·芬奇曾因同性爱遭受基督教权势的迫害。现代，仍有个别对科学、对人民事业有崇高奉献精神的人，只因为性定向与常人不同，就受到严重误解。更有一干惯于把他人伤痛作为谋私与取乐把柄的宵小，肆意侮辱和欺凌他们。

正是上述实际原因，坚定了我为国人写一部《同性爱》的决心。

在我国历史上，被封建礼教吞噬的生灵不知凡几。今天，仍有无知和愚昧在作祟。这个现实召唤着我——一个医生的良知，把我所了解的知识写出来。唯有科学的阳光，才能驱除无知、愚

昧的阴霾和诸多苦难。

我是不同意同性恋的。但作为医生，我认为反对这一现象，应该做的是切实认识它的起因和意义，透澈地明白它可能存有的危害，用科学的方法积极进行预防和处理。这才是根本。反对同性恋，不应当是简单的冷酷打击。有人指出：“也许让人们去理解和同情同性恋（者）是困难的，但医生应该劝告大家不要鄙夷和歧视他们。无端的猜疑，不负责任的蜚语是有害的。疾病、道德和法律界限的划定要十分慎重！”（《健康报》1990. 4. 26）这是一种积极的人道主义态度。同时我还认为，科学同样应该为大众所掌握！唯有被大众掌握，科学才会焕发出引导人类前行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我国是有 5 000 年璀璨光辉文化史的文明国度。但漫长岁月里，对性的真正研究却是一个冻土带。对同性恋现象的研讨，更是一个森严的禁区。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性学创建。据国外统计，仅 1898~1908 年 10 年之中，即有约 1 000 种研讨同性恋的专著出版。可是我国有关著述却如凤毛麟角，迄今更没有一部专门研讨同性恋的著作问世。

坚冰早已消融，现在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已经有一些探索者闯入同性恋研究这片禁区了。上海性社会学中心刘达临教授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女博士李银河是我国当代首开同性恋研究之先河的勇敢者。在刘达临指导下，全国 200 多位学者，于 1989~1990 年对 20 000 位国人进行了性调查。发现中国当代有 7.6% 的大学生、2.54% 的已婚农民有同性恋性行为史；在对全国 15 省市多所大学的 3 000 余位学生（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我国大众社会有关认识的发展方向）的调查中发现，目

前仅有 7.4% 的人仍坚持传统观念，把同性爱看成道德问题或罪恶行为，而有 9.6% 的人认为同性爱是少数人的正常行为，其余占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同性爱不过是一种性心理改变。李银河则深入到北京市男性同性爱亚文化群中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同性爱者的数目之多与活跃程度，均远远超出一般想象。李银河根据调查印象估测，北京市成年（即性成熟期）男性中有 2~4% 的人是同性爱者。我国影响最大的卫生专业报刊《健康报》，近年也多次刊载文章，指出同性爱的发生与生物学因素有关（而不是与道德堕落有关），不应该歧视同性爱者，严厉惩处无助于同性爱者的改变，并不加道德评判地介绍同性爱者的个人生活。听到这些先行者的足音，实在令人欣喜。

现在，我也斗胆把这部《同性爱》写出，奉献给我国年青的性学事业，希望能为这新开拓的百花园添一缕青翠。同时，我把此书奉献给国内数以千万计的因同性爱遭受种种磨难的人们，希望能为解除他们的难言之苦尽绵薄之力。为写此书，我阅读了约 200 种性学及有关学科著作，以及 1980~1992 年间 1000 余篇英文文献摘要或全文。但书中仍难免有挂一漏万和失当之处。我热诚地企望国内同道和读者，不论见仁见智，都不吝赐教。

写作此书期间，青岛医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所长秦士德教授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为我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从繁忙工作中挤出很多时间，先后披阅了本书的第二、三稿，提出不少难能可贵、独具只眼的见解；他还极其认真地阅读并代我校正了第四稿。没有秦士德教授的倾力相助，这部书是决不可能完成的。不仅如此，自我从医以来，他还使我看到了一位执著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榜样。在此，我向秦士德教授致以深深的